

唐前

谏议思想及其文化研究

彭磊 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两汉时代谏议政治及其思想文化研究』

(项目编号: 13YJC770039) 资助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唐前

谏议思想及其文化研究

彭磊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前谏议思想及其文化研究 / 彭磊著. — 广州 :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9.5
ISBN 978-7-5192-6220-4

I. ①唐… II. ①彭… III. ①奏议—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K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90028 号

书 名	唐前谏议思想及其文化研究
	TANGQIAN JIANYI SIXIANG JIQI WENHUA YANJIU
著 者	彭 磊
责任编辑	程 静 曹桔方
装帧设计	桃 天
责任技编	刘上锦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 编	510300
电 话	020-84451969 84453623 84184026 84459579
网 址	http://www.gdst.com.cn
邮 箱	wpc_gdst@163.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迪桦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35 千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192-6220-4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咨询、投稿: 020-84451258 gdstchj@126.com

自序

本书是近年来笔者对自先秦至魏晋时代的谏议思想及其文化等所做的一系列专题性研究得出的综合性成果。

笔者的初衷，主要是想对两汉时代的谏议思想及其文化等作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然而，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如果不同时对汉代之前的先秦时代及汉代之后的魏晋时代的谏议思想作出较为详尽地研究，那么，就不容易讲清楚两汉谏议思想的来源及其衍变发展的状况，相关的研究就很难做到系统而深入。鉴于此，笔者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了先秦与魏晋时代。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思考，写出了以先秦至魏晋时代谏议思想、文化等社会现象为对象的五篇专题论文：

《先秦两汉时代谏议与游说》《先秦两汉“谤”之刑罪化趋向及“谤”与“谏”关系衍变》《两汉时代谏议与灾异学说之关系》《两汉时代谏议之主题》《两汉魏晋时代谏（议）大夫与侍中之比较》。

这一系列专题性的研究，涉及先秦、两汉及魏晋时代谏议思想之内容、主题，谏官制度的发展、变化，相关的言谏思想、文化及其对于当时、后世的社会、文化的影响等诸多方面。在这些专题研究之中所提到的问题，如两汉谏议思想与灾异学说、谏议与游说、谏（议）大夫与侍中职能等，均为学术界少有关注或基本上未曾关注过的问题。因此，本书中各专题研究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学术价值。

在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之中，谏议可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谏议之兴衰，对历代王朝的命运一向是有着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纳谏者昌，拒谏者亡，素来是中国古代历史家们所信奉的一条重要的历史规律。我们如果能够积极地传承此种谏议文化并将之发扬光大，那么必能给我们今天社会的各类思想文化建设带来勃勃的生机，形成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

目 录

先秦两汉时代谏议与游说.....	1
先秦两汉“谤”之刑罪化趋向及“谤”与“谏”关系衍变.....	47
两汉时代谏议与灾异学说之关系.....	65
两汉时代谏议之主题.....	77
两汉魏晋时代谏（议）大夫与侍中之比较.....	158
参考文献.....	182

先秦两汉时代谏议与游说

谏议与游说乃是中国古代历史中，尤其是先秦至两汉这段时期内的两种重要的政治与文化现象。可以说，二者其实都是以言辞舆论的方式对当时的统治者造成影响，从而实现自己的社会、政治目的的现象。遍览史册，我们可以看到，在先秦两汉这一历史时期，社会上出现的著名的游说之士和谏臣特别多，与之相关的各类传闻、史事也特别丰富。这些说士与谏臣们对于当时的政治及文化也造成了诸多重要的影响。故此，先秦两汉时代的谏议与游说这两种现象，其实是很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并加以深入研究的。

当然，在当前学术界，不论是对游说，还是对谏议的研究，我们都已有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将谏议与游说这两种在形式上较为近似的现象结合起来，对二者作一个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则并不多见。鉴于此，本文对先秦两汉的谏议与游说作一个综合性的比较研究，辨析二者的相似及差异之处，剖析二者的相互联系与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阐释谏议与游说这两种现象各自对当时社会、政治及文化发展的意义。这样的研究对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先秦及两汉时代社会、政治、文化，尤其是士阶级的特征有一定的开拓性价值。

大体而言，本文对先秦两汉谏议与游说的比较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其一，先秦两汉时代谏议与游说概念的异同；其二，二者之间的一种“此消彼长”；其三，对二者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价值作一个比较。

一、先秦两汉时代谏议与游说概念的异同

（一）先秦两汉时代谏议与游说的不同之处

从词义、概念来看，“谏议”指的是臣民们以舆论、言辞的方式给统治者提出批评性、建设性的意见，使统治者改正自己的失误，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众与国家的利益，使统治者的江山社稷更为稳固长久。“游说”指的是游说者运用富于煽动力的言辞来打动、说服统治者，使之依从游说者的意见而采取某种行动。这种行动的结果必定是对游说者本人或由其本人所代表的某个群体、集团有利的，至于它是否对统治者，以及统治者的国家、人民有利，那就

不一定了。因此，从概念上看，谏议与游说的性质有着鲜明的区别。具体而言，谏议与游说的区别又可分为两点：

第一点，最明显也是主要的，乃是二者的动机、目的不同。

在大多数情况下，臣民们之所以会向统治者进谏，其动机、目的皆在于表达对统治者的忠诚之意，以及对国家、民众尽职尽责的公义精神。从先秦到两汉的许多谏议事例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进谏者们的这种忠诚的情怀与追求公义的精神。譬如发生在西周后期的“召公谏厉王弭谤”事件，即表明了周厉王的属下谏臣召公的忠于国君，而又心系民众的高尚情怀与精神。《国语·周语上》记曰：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召公的进谏之言，始终都不离一个“民”字。他一再地强调统治者应该大度地听取与接纳民众对政治的批评——“为民者宣之使言”。这充分地表明了他尊重民众说话的权利、关心民生疾苦的拳拳之意。当然，他一方面挂念民众，另一方面也关心周王朝统治者的江山社稷。他说道：“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表明他已认识到了是否允许民众自由发表意见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同样的忠君爱民的情怀，在《国语·周语上》中所载的“仲山甫谏宣王料民”条中，亦有体现：

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廩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审之以事，王治农于籍，搜于农隙，耨获亦于籍，獮于既烝，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不谓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恶事也。临政示少，

诸侯避之。治民恶事，无以赋令。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废灭。

仲山甫之劝谏周宣王不要随意在太原清查人口，乃在于使宣王更加勤政爱民，不要“使民恶事”，这里自然也有关心民众的用意。当然，由他的“无胡而料民……后嗣”一句话，我们又可看出仲山甫更加在意的则是周宣王以及他的后嗣的统治是否能稳固，故而又明显地有忠君之心。又据《国语·楚语上》的记载，在春秋时代，楚国的谏臣白公子张讽楚灵王纳谏之事，亦充分表明了白公子张的爱民忠君之意：

灵王虐，白公子张骤谏。王患之，谓史老曰：“吾欲已子张之谏，若何？”对曰：“用之实难，已之易矣。若谏，君则曰余左执鬼中，右执殇宫，凡百箴谏，吾尽闻之矣，宁闻他言？”

白公又谏，王如史老之言。对曰：“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于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国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旁求四方之贤，得传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若武丁之神明也，其圣之睿广也，其智之不疚也，犹自谓未义，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犹不敢专制，使以象旁求圣人。既得以为辅，又恐其荒失遗忘，故使朝夕规诲箴谏，曰：‘必交修余，无余弃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恶规谏者，不亦难乎！……《周诗》有之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臣惧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

白公子张在其谏言中，引用了《诗经·小雅·节南山》“弗躬弗亲，庶民弗信”之语，表明了他希望君主能亲近民众，以保障民众权益，赢取民众信任的意愿。而赢取民众信任最重要的目的，无疑是维护楚王政权的长治久安。春秋后期的名臣晏子，也是一位常借着各种时机向国君进谏的人士。《晏子春秋·内篇谏》之中记载了许多晏子进谏的行为。如《内篇谏上》中有一条载云：

景公观于淄上，与晏子闲立。公喟然叹曰：“呜呼！使国可长保而传于子孙，岂不乐哉？”晏子对曰：“婴闻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虚至。今君以政乱国，以行弃民久矣，而声欲保之，不亦难乎！婴闻之，能长保国者，能终善者也。诸侯并立，能终善者为长；列士并学，能终善者为师。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贤

而赞德之时，亡国恃以存，危国仰以安，是以民乐其政，而世高其德，行远征暴，劳者不疾，驱海内使朝天子，而诸侯不怨。当是时，盛君之行不能进焉。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并于乐，身溺于妇侍而谋因竖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宫而不举，虫出而不收。当是时也，桀纣之卒不能恶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不能终善者，不遂其君。今君临民若寇讎，见善若避热，乱政而危贤，必逆于众，肆欲于民，而诛虐于下，恐及于身。婴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则持节以没世耳。”

晏子借着齐桓公的例子向齐景公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为政清明，百姓归附，统治者的权位就可以长久稳定；若为政混乱，百姓怨离，则统治者不仅难保江山，甚至不免有性命之忧。借着这个道理，他向景公进谏，希望景公不要“临民若寇讎”，应该节制自己的欲望，保养百姓以维护政权。这番谏言，自然也体现了晏子忧念百姓，忠心于自己的君主与国家的情怀。

在西周、春秋时代之后，汉代也是一个谏臣层出不穷的朝代。这些谏臣们向统治者进献谏言，其主要的动机、用意也大多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权力与地位，同时也有为百姓及国家的利益考虑的因素。所以，“忠君爱民”仍然是汉代谏议的最主要的内容。早在汉高祖刘邦还在打天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由刘邦所信任或重用的一些大臣或武将向刘邦进献忠谏之言的事例。像《史记·留侯世家》（卷五五）之中，即有一段张良、樊哙共同劝谏刘邦的记载：

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编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原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樊哙为刘邦身为平民时的朋友，张良则为刘邦向来言听计从的著名谋士，且有着“帝王师”的身份。二人皆可谓刘邦的心腹之臣。在此段记载中，樊哙劝谏刘邦不要因为灭了秦，就沉溺于狗马、妇女、重宝之中，张良也对刘邦阐明了“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道理。二人的忠谏之言，亦明白地表达了他们对于自己所事奉的君主——刘邦的耿耿忠心。

到了汉朝建立之后的汉文帝时代，又出现了一位著名的谏臣张释之。他曾多次向文帝直谏，一方面表现了其正直的性格与直言的勇气；另一方面，更体现了他一腔忠君爱民的心志。《汉书·张释之传》（卷五〇）中曾记录一道：

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行过，既出，见车骑，即走耳。”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

在此段记载中，身为廷尉的张释之向汉文帝表达了一种“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观念。在一向盛行人治的君主专制社会里，这样的言论真可谓是凤毛麟角，震聋发聩。当然，张释之之所以鼓起勇气劝谏文帝，维护法律的公平，其着眼点仍在于保障人民的一些基本的权利。像他所宣称的：“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措其手足？”正体现了其拳拳的爱民之心。

到了西汉后期，著名的谏臣则有刘向、谷永等人。在他们向皇帝所进的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一腔热忱的忠君爱国之意。尤其是刘向，他曾多次向汉元帝与汉成帝上书进谏，其谏诤的内容大多数为抑制权奸（如石显与弘恭之流）、防外戚（主要指王氏）、用贤人。因为刘向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文人，故其进谏之文大多例证丰富、条理明晰、文辞畅达。《汉书·刘向传》（卷三六）记叙道：

时上无继嗣，政由王氏出，灾异浸甚。……向遂上封事极谏曰：

臣闻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术也。夫大臣操权柄，持国政，未有不为害者也。昔晋有六卿，齐有田、崔，卫有孙、甯，鲁有季、孟，常掌国事，世执朝柄。终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崔杼弑其君光；孙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并专国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管朝事，浊乱王室，子朝、子猛更立，连年乃定。故经曰“王室乱”，又曰“君氏杀王子克”，甚之也。《春秋》举成败，录祸福，如此类甚众，皆阴盛而阳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书》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泾阳、叶阳君专国擅势，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权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国，国甚危殆，赖寤范雎之言，而秦复存。二世委任赵高，专权自恣，壅蔽大臣，终有阎乐望夷之祸，秦遂以亡。近事不远，即汉所代也。

汉兴，诸吕无道，擅相尊王。吕产、吕禄席太后之宠，据将相之位，兼南北军之众，拥梁、赵王之尊，骄盈无厌，欲危刘氏。赖忠正大臣绛侯、诛虚侯等竭诚尽节以诛灭之，然后刘氏复安。今王氏一姓乘殊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虽周皇甫、秦穰侯、汉武安、吕、霍、上官之属，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为其人微象。孝昭帝时，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虽立石起柳，无以过此之明也。……夫时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宜发明诏，吐德音，接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第，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复见于今，六卿必起于汉，为后嗣忧，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图，不可不蚤虑。《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唯陛下深留圣思，审固几密，览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万安之实，用保宗庙，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上述文字明显地体现了身为刘姓宗室一员的刘向对汉成帝时外戚王氏之擅权有可能会危及汉王朝气运表现出的担忧与焦虑，故而不厌其烦地借着历史上的事例和上天的灾异来向汉成帝发出劝谏与警诫，希望他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阻止外戚王氏势力的恶性膨胀。只可惜成帝虽然叹息悲伤，却没能真正采纳刘向的谏议，仍然任由王氏的权势越来越大而不加以抑制。在刘向去世后只过了十来年，王莽就篡夺了西汉王朝的政权。这样的结果充分证明了刘向政治预见的准确性，同时也表明了他对汉王朝和皇帝是满怀忠诚之意的。

随着儒家经学的进一步发展，与西汉时代的士大夫们比起来，东汉时代的一些被人们称为“清流”的士人们则显得更重视名节的维护，以及个人品德的培养。受此种文化氛围的影响，朝野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义节之士，刚直之臣，如杨震、李固、杜乔、李膺、陈蕃等人。这些强调名节的士子们，又大多数处于一个外戚跋扈、宦官专权、朝政日益腐败的政治环境之中。因为激愤于时政，他们自然常常向君主上书直谏。其谏诤之内容大体上皆为对权奸、外戚及宦官的严厉批评和对朝政清平、百姓安乐的殷切期盼。如据《后汉书·杨震传》（卷五四）所载，杨震曾因汉安帝时私幸权奸王圣、王伯荣诸辈擅权乱政愤而上书于安帝进谏言道：

臣闻政以得贤为本，理以去秽为务。是以唐虞侯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幸充庭。阿母王圣出自贱微，得遭千载，奉养圣躬，虽有推燥居湿之勤，前后赏惠，过报劳苦，而无厌之心，不知纪极，外交属托，扰乱天下，损辱清朝，尘点日月。《书》诫牝鸡牡鸣，《诗》刺哲妇丧国。昔郑严公从母氏之欲，恣骄弟之情，几至危国，然后加讨，《春秋》贬之，以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远之怨，实为难养。《易》曰：“无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与于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伯荣，莫使往来，令恩德两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绝婉嬖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万机，诚慎拜爵，减省献御，损节征发。令野无《鹤鸣》之叹，朝无《小明》之悔，《大东》不兴于今，劳止不怨于下。拟踪往古，比德哲王，岂不休哉！

同类的，据《后汉书·陈蕃传》（卷六六）之记载，在汉桓帝之时，由于桓帝宠幸宦官，致使宦官专权、扰乱朝政，陈蕃乃不顾个人的安危，数度上书进谏于桓帝，力斥宦官之祸国，又全力营救为宦官、权奸所陷害的清流党人：

臣闻齐桓修霸，务为内政；《春秋》于鲁，小恶必书。宜先自整敕，后以及人。今寇贼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寝不能寐，食不能饱，实忧左右日亲，忠言以疏，内患渐积，外难方深。陛下超从列侯，继承天位。小家畜产百万之资，子孙尚耻愧失其先业，况乃产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轻忽乎？诚不爱已，不当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内，天启圣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议，冀当小平。明鉴未远，覆车如昨，而近习之权，复相扇结。小黄门赵津、大猾张汜等，肆行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刘璜、南阳太守成瑨，纠而戮之。虽言赦后不当诛杀，原其诚心，在乎去恶。至于陛下，有何愾愾？而小人道长，营惑圣听，遂使天威为之发怒。如加刑谪，已为过甚，况乃重罚，令伏欧刀乎！又，前山阳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奉公不挠，疾恶如仇，超没侯览财物，浮诛徐宣之罪，并蒙刑坐，不逢赦恕。览之从横，没财已幸；宣犯衅过，死有余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责邓通，洛阳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从而请之，光武加以重赏，未闻二臣有专命之诛。而今左右群竖，恶伤党类，妄相交构，致此刑谴。闻臣是言，当复啼诉。陛下深宜割塞近习豫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壹朝，简练清高，斥黜佞邪。于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祲符瑞，岂远乎哉！陛下虽厌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强，敢以死陈。

诚然，由于当时君主昏聩，朝纲紊乱，如杨震、陈蕃之类的刚直清正的大臣们多数都为权奸宦官们所诬譖、陷害，境遇凄惨。汉桓帝、灵帝时代发生的两次党锢之祸，更使得清流士人团体元气大损。但无论如何，他们在向君主的直言劝谏中所表现出的刚正不阿、忠君忧国的精神则足以可以光耀后世，彪炳千秋。

与谏议相对的，从先秦迄于两汉时代的众多关于游说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善于辞令的士人们游说君主或掌权者的最主要的动机与目的，乃在于谋求一己之私利或自己所代表的那个团体的利益。相对而言，在大部分游说者的心目中，国家、民族的公共利益以及自己游说的统治者乃是次要的，有时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自己或由自己所代表的集团的私利与国家、民众或君主的利益发生了冲突，那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抛弃国家、民众的公共利益以满足自己这边的私利。尽管有一些游说者常常将自己塑造为大公无私、忠君爱国的形象，但这实质上都不过是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游说效果所玩的花样而已。

此处所提到的游说之士大多带有战国时代纵横家的色彩。这些游谈纵横之士中的佼佼者，自然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苏秦、张仪、酈食其等人物。由史册中所记载的这类人物的言行，我们即可以大致见到游说之士们崇尚一己之功利，轻视国家人民的公义的特质。就以这类人士中最有名的苏秦而言，他提倡六国合纵，以对抗强秦。由于口才出众，极富于煽动力，故而打动了六国君主，身佩六国相印，名声满天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着力倡导合纵而与秦国为敌的苏秦，在开始他的游说事业的时候，首先想到的竟是以“连横”的策略，到秦国去谋取功名富贵。《战国策·秦策一》（卷三）记载道：

（苏秦）乃夜发书，陈篋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

从上述记载可知，对苏秦本人而言，无论是为六国谋利益的合纵，抑或是为秦国着想的连横都不重要，最重要的，乃是“金玉锦绣”“卿相之尊”这些实实在在的功名利禄。并且，他之所以力倡合纵，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由于秦国国君在一开始拒绝了他的游说，不重用他而对秦国产生的私怨。《战国策·秦策一》（卷三）载曰：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镒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负书担囊，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紝，嫂

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

以上种种，皆表明了苏秦这个战国时代最有名的游说之士在游说诸侯时的主要动机在于个人的荣华富贵，以及个人的恩怨。秦国或六国的国家利益，以及各国百姓的利益在他眼中都是不屑一顾的。

与苏秦齐名的张仪，则以倡导“连横”而出名。虽然二人的政治主张针锋相对，但其性格及思想本质则是一样的。他周游列国，说动王侯，最大的目的与动机，仍在于谋取功名利禄，同时也有着个人恩怨的因素。例如，张仪曾屡屡耍阴谋诡计来游说、迷惑楚王，使楚国多次蒙受巨大损失。其主要的缘故，则在于为自己所事奉的秦国及本人谋求利益——扩充秦国的土地及势力，使秦王更加重视而依靠自己，给予自己更为丰厚的赏赐与爵禄。《史记·张仪列传》（卷七〇）记载道：

秦欲伐齐，齐楚从亲，於是张仪往相楚。楚怀王闻张仪来，虚上舍而自馆之。曰：“此僻陋之国，子何以教之？”仪说楚王曰：“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於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妇嫁女，长为兄弟之国。此北弱齐而西益秦也，计无便此者。”楚王大喜而许之。群臣皆贺，陈轸独吊之。楚王怒曰：“寡人不兴师发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贺，子独吊，何也？”陈轸对曰：“不然，以臣观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齐秦合，齐秦合则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说乎？”陈轸对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齐也。今闭关绝约於齐，则楚孤。秦奚贪夫孤国，而与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张仪至秦，必负王，是北绝齐交，西生患於秦也，而两国之兵必俱至。善为王计者，不若阴合而阳绝於齐，使人随张仪。苟与吾地，绝齐未晚也；不与吾地，阴合谋计也。”楚王曰：“原陈子闭口毋复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张仪，厚赂之。於是遂闭关绝约於齐，使一将军随张仪。张仪至秦，详失绥堕车，不朝三月。楚王闻之，曰：“仪以寡人绝齐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骂齐王。齐王大怒，折节而下秦。秦齐之交合，张仪乃朝，谓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原以献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闻六里。”还报楚王，楚王大怒，发兵而攻秦。陈轸曰：“轸可发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赂秦，与之并兵而攻齐，是我出地於秦，取偿於齐也，王国尚可存。”楚王不听，卒发兵而使将军屈匄击秦。秦齐共攻楚，斩首八万，杀屈匄，遂取丹阳、汉中之地。楚又复益发兵而袭秦，至蓝田，大战，楚大败，於是楚割两城以与秦平。

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楚王曰：“不原易地，原得张仪而献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张仪乃请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负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张仪曰：“秦强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郑袖，袖所言皆从。且臣奉王之节使楚，楚何敢加诛。假令诛臣而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原。”遂使楚。楚怀王至则囚张仪，将杀之。靳尚谓郑袖曰：“子亦知子之贱於王乎？”郑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爱张仪而不欲出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美人聘楚，以宫中善歌讴者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贵而夫人斥矣。不若为言而出之。”於是郑袖日夜言怀王曰：“人臣各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张仪来，至重王。王未有礼而杀张仪，秦必大怒攻楚。妾请子母俱迁江南，毋为秦所鱼肉也。”怀王后悔，赦张仪，厚礼之如故。

在这段记载中，张仪简直是将楚怀王玩弄于股掌之上，使楚国不仅与齐国断绝了合纵之约，还损兵折将，失掉了丹阳、汉中、黔中等地方。相对的，秦国不仅并未失去商於、五关之地，还侵夺了楚国的大片土地。于张仪而言，则自然是更受秦惠王的赏识，且能获得更多的封赏。当然，张仪之所以会这样大玩阴谋诡计以陷害楚国，其实也有报私怨的原因。《史记·张仪列传》（卷七〇）记曰：

张仪已学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醢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

张仪任秦相多年，以连横之策为秦国谋取了巨大的利益，使六国更加困窘而被迫臣服于秦国。秦在以后能够一统天下，连横的计策实在是功不可没。然则张仪本人对于秦国是否就绝对忠诚呢？由史册之载，我们可以看到事实并非如此。譬如《史记·张仪列传》（卷七〇）又记道：

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恶张仪未已，而齐让又至。张仪惧诛，乃因谓秦武王曰：“仪有愚计，原效之。”王曰：“奈何？”对曰：“为秦社稷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闻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原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齐必兴师而伐梁。梁齐之兵连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秦王以为然，乃具革车三十乘，入仪之梁。齐果兴师伐之。梁哀王恐。

张仪曰：“王勿患也，请令罢齐兵。”乃使其舍人冯喜之楚，借使之齐，谓齐王曰：“王甚憎张仪；虽然，亦厚矣王之托仪於秦也！”齐王曰：“寡人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何以托仪？”对曰：“是乃王之托仪也。夫仪之出也，固与秦王约曰：‘为王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原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齐必兴师伐之。齐梁之兵连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无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案图籍，此王业也。’秦王以为然，故具革车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仪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内罢国而外伐与国，广邻敌以内自临，而信仪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谓‘托仪’也。”齐王曰：“善。”乃使解兵。张仪相魏一岁，卒於魏也。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秦惠王在世之日，对于张仪颇多信从，当其去世之后，即位的秦武王则不大喜欢张仪。张仪本为一聪明之极之人，自然知道自己在秦国无法长久待下去了，于是耍了一个计谋，以“成王业”的理由使秦国遣送自己到了魏国，随即引来了齐国讨伐魏国，这时，张仪又令自己的舍人冯喜去游说齐王，说齐伐魏反而会使秦国得利，齐王不愿让秦国得利，自然就退兵了。这样，魏王感激张仪说服齐国退兵，也就厚厚地酬谢他，任命他为魏国相国，魏国国力虽比不上秦国，不过张仪至少由此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与利禄。以一个计谋便把秦、齐、魏三个大国耍得团团转，使得这三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成了自己长保利禄的工具，可见张仪手段的厉害。同时我们也可以明白看出张仪对秦国并非绝对地忠诚。他如果真的忠于秦国，就应该甘心受戮，或者像屈原那样自尽，还可以选择隐居，远离政治。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跑到另一个国家继续做相国。可见，对张仪而言，不论是秦国、魏国还是齐国，都只不过是为自己服务的工具而已，自己的功名利禄和私人恩怨，才是至关重要的。

战国之世，除了苏秦、张仪之外，还有许多善于游说的谋士及大臣，如楚国的春申君黄歇，虽身为楚国权臣，但亦长于辩说。楚王之所以会重用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曾经为了楚国而向秦昭王上书游说，使得秦国暂停攻打楚国。《史记·春申君列传》（卷七八）述曰：

黄歇见楚怀王之为秦所诱而入朝，遂见欺，留死於秦。顷襄王，其子也，秦轻之，恐壹举兵而灭楚。歇乃上书说秦昭王曰：

天下莫强於秦、楚。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与斗。两虎相与斗而弩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请言其说：臣闻物至则反，冬夏是也；致至则危，累

棋是也。今大国之地，遍天下有其二垂，此从生民已来，万乘之地未尝有也。……臣闻之，敌不可假，时不可失。臣恐韩、魏卑辞除患而实欲欺大国也。何则？王无重世之德於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将十世矣。本国残，社稷坏，宗庙毁。刳腹绝肠，折颈摺颐，首身分离，暴骸骨於草泽，头颅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系脰束手为群虏者相及於路。鬼神孤伤，无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仆妾者，盈满海内矣。故韩、魏之不亡，秦社稷之忧也，今王资之与攻楚，不亦过乎！……苟且王攻楚之日，四国必悉起兵以应王。秦、楚之兵构而不离，魏氏将出而攻留、方与、铎、湖陵、碭、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攻楚，泗上必举。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而使独攻。王破楚以肥韩、魏於中国而劲齐。韩、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齐南以泗水为境，东负海，北倚河，而无後患，天下之国莫强於齐、魏，齐、魏得地葆利而详事下吏，一年之後，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为帝有馀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众，兵革之彊，壹举事而树怨於楚，迟令韩、魏归帝重於齐，是王失计也。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以临韩，韩必斂手。王施以东山之险，带以曲河之利，韩必为关内之侯。若是而王以十万戍郑，梁氏寒心，许、鄢陵婴城，而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如此而魏亦关内侯矣。王壹善楚，而关内两万乘之主注地於齐，齐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经两海，要约天下，是燕、赵无齐、楚，齐、楚无燕、赵也。然後危动燕、赵，直摇齐、楚，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谢韩、魏。发使赂楚，约为与国。

春申君黄歇的说辞，可谓义理明达，情意真挚，极具说服力。秦昭王看过后，果然停止了对楚国用兵，使楚国暂时躲过了灭国之祸。在这篇说文中，黄歇口口声声都是秦国的“社稷之忧”，故而能打动秦昭王。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黄歇之所以一再地提及秦国的利益，主要目的是奉劝秦王不要攻打楚国而与之保持和平的关系。所以，这篇说文表面上是为秦国着想，实则是为楚国谋利。那么，黄歇是否就绝对忠心于楚国及楚王呢？其实也未必，他之所以要为楚国谋利，说到底还是希望从楚国那里为自己博取功名利禄。在很大程度上，他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楚考烈王一即位，便封他为春申君。对于这位赐予了他荣华富贵的考烈王，黄歇内心之中其实也并无绝对忠诚之意。如《史记·春申君列传》（卷七八）记述道：

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求妇人宜子者进之，甚众，卒无子。赵人李园持其女弟，欲进之楚王，闻其不宜子，恐久毋宠。李园求事春申君为舍人，